

第 8 卷第 5 期 2015 年 12 月

Vol. 8, No. 5, December, 2015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主题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可测量性和可比性的谜团.....	167
跨国教育对接收国的影响.....	170
流动性是关键：“伊拉斯谟影响研究”.....	173
抵制东南亚校园极端主义.....	176

欧洲趋势与挑战

希腊高等教育：长期挑战与当前危机.....	179
欧洲大学中的“不发文”学者.....	181
欧洲高校的合并之风.....	183
欧洲短期高等教育中公私立模式转换.....	185

中东欧的高等教育

阿尔巴尼亚的高等教育：永无止境的挑战.....	187
罗马尼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189
俄罗斯大学中的制度性腐败.....	192

国家与地区

加利福尼亚与公立高等教育的未来.....	194
越南国际合作教育项目的陷阱.....	197
印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	200

新书速递.....	203
-----------	-----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可测量性和可比性的谜团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首任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 (the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HELO) 已经开展了十年之久, 其基本概念是对不同国家的某些学科领域内的学生进行测试, 据此进行跨国间学生学习成果的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于 2012 年对其进行了可行性调查, 并在 2015 年提出要全面实施这一项目。大部分人认为项目试行注定失败, 也很难预见该项目的重启是否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众人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了使用的测量工具 (基于美国大学生学习评价 [US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的稳定性, 还牵涉跨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的支持者认为, 现在人们比较学术机构和体系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有方法论缺陷的排名, 其有效性可想而知。他们同时指出, 这种排名比较方法并没有涵盖对学习成果的测量。虽然这些支持者声称“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不是排名, 但他们所倡导的对机构和国家间成果的比较,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等级次序。事实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德烈斯·施莱谢尔 (Andreas Schleicher) 于 5 月 7 日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中指出, 据他推测, “高等教育学

习成果评估”可能会成为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排名。

历史背景

2010 年 1 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高等教育机构管理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计划提出开发一种全球通用的学习成果测试。随后, 该组织开展了涵盖 17 个国家及美国三个州、花费高达一千万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研究包括两个学科, 即经济学和土木工程, 以及一些分类不甚明晰的“一般技能”。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委员会建议在 2012 年结束该项目, 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管理部门正寻求继续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许多人都对此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通过停刊其优秀期刊《高等教育和政策》(Higher Education and Policy) 以及其他举措来系统地削弱其高等教育项目。高等教育机构管理项目本身恐怕也难以幸免。因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否有能力精心管理一个像“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这样高度复杂的项目还是个问题。

谁来买单?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项目于 2015 年 4 月发布了修订的规定范围文件 (scoping

paper),其中并未对研究开展过程中的资助方作出明确说明。此项研究开展的最初几年将耗费数百万美元的费用。因此,加入“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项目的每个国家不仅要支付参与费用,同时也要承担经合组织官僚机构用来统一规划和协调的支出。

一些基本问题

关于“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概念和实用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层出不穷。其中的许多问题被证明是充分可信的,因此那些负责可行性研究的评估人员建议结束此项目。有关新项目的基本概念与2015年4月发布的文件内容没有太大出入,它显然是新项目的主要路线图。

要制定通用标准来比较众多特点迥异的国家,这似乎很难实现。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入学年龄在全球各国各不相同。一些规模较小、高度同源的地区容易得到高分。也许芬兰和上海在“中学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考试”(the secondary school PISA test)中取得高分正是得益于此。至少在中学层面,我们还有可能寻找到不同国家间在课程方面的共性。但在高等教育层面,课程和课程体系差异显著,很难想象有多少共性。此外,谁来定义什么是跨机构和跨国家不同学科的“黄金标准”呢?因此,“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也许能用来评估苹果和橘子,但很难区分金橘和西兰花。

入学门槛高的学校其表现可能会优于那些入学门槛较低的学校。毕竟,“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测试的不是“增值”知识(value-added knowledge),而是一段时间内的成绩。可以预测的是,幅员辽阔、高度多

样化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 学生取得的成就、获取的知识会更多。在多元化的系统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要考察的是所有的中学后教育,还是只考察正规的大学教育?

目前的项目似乎更强调一般技能,而不是可行性研究。这些技能主要是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但这些技能因其自身不可捉摸的特性难以界定,同时,要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去解释它们也更具有挑战性。批判性思维可能在中国是一回事,在挪威又是另一回事。少数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国家把发散思维和沟通能力都列入了课程之中,如许多美国的高校,他们在这方面可能具有优势。但即使在美国,在不同院校之间,人文科学的定义也有着很大不同。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本科教育高度专业化,学生往往进入以具体学科为基础的院系学习,没有机会培养通识技能。学生可能在中学学过这些技能,但不同国家持续的时间不等,这为评估高等教育成就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次评估选择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和经济学,这也存在问题。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促进达成有关高等教育内容方面的共识,但这一过程还需投入更多。即便是土木工程专业,不同大学和国家在界定知识基础和学习深度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学专业存在着更大的问题,这是因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政治现实,因此教学方法各不相同。此外,本科学习商科课程的学生学到的知识将会和经济学院课程体系中 学生学到的知识有所不同。而那些学习专业性较强课程的学生可能会比学习宽泛课

程的学生获得更加深入的知识。

如果在这两个已合理定义的专业中都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在人文学科或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上比较学生的成就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虽然“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项目测量的是三年制学位项目（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现有模式）中第一年年底的学习情况，但它很可能与四年制学位项目的国家产生差异（北美和亚洲大部分国家采用此种学制）。安排三年课程项目的国家第一年可能需要安排更多的课程内容。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可行性研究正有着这些及其他相关问题，这可能会为停止继续此项目的建议提供参考。

放弃这个既差劲又昂贵的项目吧

继续大范围推进“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

估”似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该项目不仅远未达成广泛共识，也鲜有感兴趣的参与者；调查报告预计只有八个国家参与。该项目成本高昂，达数百万美元。虽然这次项目几乎完全由参与国出资，但经合组织似乎想全面掌控这次研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各学术机构甚至各国政府部门如何在此研究的管理和构思上获得重要话语权。我们也不知道，“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主要问题仍是关于基本方法、所使用的评估工具和努力的方向。人们在可行性研究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或者可以说是浪费了这些资金。现在，有机会节省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些真正关心学生学习质量和学习成果的人可能要更好地专注于开发真实性评价工具，以便高校更好地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提升。

跨国教育对接收国的影响

Jane Knight, John McNamara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sympatico.ca

John McNamara: 麦克纳马拉经济研究中心 (McNamara Economic Research) 研究主任

电子邮箱: johnmcnamara@mcer.eu

多年来, 跨国教育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即学术项目和教育团队的跨境流动,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模式, 为教育机构拓展业务提供了机遇, 也为接收国和学术机构扩大入学增加了选择性。毫无疑问,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可以不必前往学位授予国而在国内接受国际高等教育课程。随着高等教育机构设立海外分校、在接收国开展教学项目或与当地机构进行合作, 这种现象愈发普遍。

迄今为止, 关于跨国教育的大多数研究、讨论和辩论都是以派出国视角出发的。有批判者表示, 跨国教育是由派出国发起的、为了盈利和提高国际地位的活动, 鉴于此, 近日来人们频繁地探讨“跨国教育是一种双赢”的观点。这或许是正确的, 但为了验证跨国教育对接收国的影响, 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为此, 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 同时参与此次研究的还有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中心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法国教育服务中心 (Campus

France), 以及伦敦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in London)。针对此次研究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被派发了八个不同的目标群体, 即跨国教育学生、跨国教育教师、资深跨国教育机构领导、高等教育专家、政府机构、雇员和非跨国教育学生, 以及非跨国教育教师,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十个跨国教育发展较快的国家。通过分析这 1906 份问卷, 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跨国教育学生的不同背景

对于跨国教育学生个人背景的深入剖析是该研究的一个有趣且有用的结果。虽然没有典型的跨国教育学生, 但该数据表明, 跨国教育学生的年龄一般都比传统的中学离校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年龄大。跨国教育学生中部分具有工作经验, 大量学生选择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 这些也是导致学生年龄偏大的一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在学习期间, 较高比例的学生参加全职工作, 晚上或周末集中的授课方式使之成为可能。显然, 对于那些需要平衡工作、学习和其他生活需求的学生来说, 跨国教育的灵活性具有很大吸引力。

“职业发展”是学生选择跨国教育的主要动因

了解学生选择跨国教育的原因对于了解他们的预期和目标至关重要。学生传达的一个明确信息是，他们认为跨国教育是一种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从而拓展职业前景的途径。跨国教育学生还认为，雇主认为跨国教育背景在公司招聘中占优势。在此列举两个主要的原因：（1）国外院校/教育体系的声誉与地位；（2）较之于非跨国教育学生，跨国教育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经历。虽然学生们认为雇主更青睐跨国教育毕业生，但关于雇主对跨国教育的认识程度、跨国教育的价值以及雇主对员工跨国教育深造的支持等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跨国教育花费——喜忧参半

对学生来讲，相对于出国留学，跨国教育的可负担性是最大的好处。同时这也表明，人们对国际教育需求的增加可以部分通过跨国教育项目和教育流动来满足，这也突显出跨国教育学生和传统学生流动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另一方面，与当地的学术课程相比，跨国教育的高成本是其主要的弊端。关于学费设定、可负担性以及跨国教育学费如何与当地教育机构学费相比较的问题，是学生和学校非常关心的话题。在研究跨国教育成本和效益中，我们应对跨国教育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性予以关注，如分校、特许经营/结对、远程教育（包括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以及联合/双学位项目等。

入学率的提高：最大收益

来自跨国教育高层领导、高校专家、政

府机构和用人单位的反馈表明，跨国教育将会是“为当地学生提供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和“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整体质量”的最大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还表明，一般情况下，跨国教育与本地教育机构提供的课程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跨国教育提供派出国不具备的专门课程的神话。大多数情况下，跨国教育课程似乎是根据学生的需求而定的。

跨国教育意识的缺乏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就是，接收国的整体跨国教育意识比较缺乏。大多数非跨国教育学生和非跨国教育教师受访者没有在自己的国家甚至是院校中意识到存在跨国教育的机会。接受调查的雇主往往表示缺乏对跨国教育经历的认识，或是对此存有疑惑。这表明，这些跨国项目的全部潜力没有实现，在接收国宣传跨国教育机会方面，人们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毕业生专业优秀却并不符合当地需求

所有目标群体认为，跨国教育毕业生比当地学生掌握了更多特定的技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国际视野。尽管跨国教育毕业生被认为技能相对优秀，但研究表明，跨国教育可能只是在当地劳动力市场“适度”地缩小了技能差距。虽然囊括小众技能的跨国教育专业，被认为对解决当地的技能差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许多跨国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在当地学校也可以获得。

跨国教育的前景

受访者普遍看好跨国教育的发展，他们表示，新项目的数量和现有项目的容纳量在

中期内将继续增长。就帮助建设当地知识经济及产出合作研究成果而言，跨国教育似乎会在接收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经济方面，如跨国教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的能力，其效果貌似不太明显，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国政府的政策和国家的具体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跨国教育总体上对接收国具有积极的影响，特别是跨国教育为当地学生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很少有实证来支持这些看法，因为几乎没有跨国教育接收国有能力或意愿来收集本国所有跨国教育机构的招生数据。所以，对于接

收国来说，统计本国跨国教育机构数量和类型、当地学生及居住在本国的外籍学生录取总数、跨国教育项目中国际学生录取数等数据，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注：更多信息请参考 British Council and DAAD (2014) *Impacts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on host countries*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education/ihe/knowledge-center/internationalization/impacts-transnational>)。

流动性是关键：“伊拉斯谟影响研究”

Uwe Brandenburg, Obdulia Taboadela, Mihaela Vancea

Uwe Brandenburg: 德国柏林 CHE 咨询公司 (CHE Consult) 任事股东

电子邮箱: Uwe.brandenburg@che-consult.de

Obdulia Taboadela: 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A Coruña) 社会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Obdulia.taboadela@udc.es

Mihaela Vancea: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

电子邮箱: mihaela.vancea@upf.edu

在欧洲, 雇主对毕业生技能的需求似乎与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到的技能明显不匹配。欧洲有 570 万年轻人失业, 包括许多高校毕业生, 同时却有三分之一的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招不到有合适技能的人才。人们分析了雇主需求与年轻人,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所提供的技能之间显著不匹配的情况, 这项分析可能为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方面的决策者提供有效信息。这也是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开展对伊拉斯谟计划 (Erasmus program) 的分析并特别强调就业能力的原因之一。

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

从 1987 年直到 2012/13 年底, 4 000 多所高校的三百多万学生参加了伊拉斯谟流动计划。伊拉斯谟流动计划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全球最大的流动项目。它的开展是为了促进高等院校学生的流动。因此, 评估该计划对就业的贡献可能会揭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普遍问题。研究表明, 一般来说, 流动性, 特别是伊拉斯谟流动计划, 可能是解决雇主期望和员工能力之间不匹配问题的一种方案。以往的研究发现, 接受过海外教育或培

训的年轻人在特定学科获取了更多知识并强化了重要的横向技能。不过, 很多时候, 对流动性影响的研究至今只是依靠道听途说、假设或最佳感知。

另一方面, 即使流动性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如上所述, 这可能仅仅只是在少数情况有效。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是流动的, 这是一种错觉, 因为流动性似乎与社会地位有关。一些研究比较了流动和非流动的学生, 并揭示了参加流动计划的学生和从未出国学习的学生间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除了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 打算出国的学生往往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得分较高。流动学生似乎是内在驱动型的, 他们重视整体的国际经验, 而不那么在意短期效果。“伊拉斯谟影响研究” (Erasmus Impact Study) 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新见解。

到目前为止, 除了涉及出国留学倾向和个性特征间的关系外, 还没有任何研究将社会的选择性、流动性与影响就业的相关人格特质联系起来。“伊拉斯谟影响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它同时解决了所有五个相关目标群体的问题: 学生、校友、教职工、高等教育机构、雇主。此外, 它超

越了跨文化和语言技能的传统问题，引入了对个人真实人格特质心理相关分析的新元素，使用了从备忘录（“监控交换流动结果”，即 monitoring exchange mobility outcome，简称 memo©）项目精选的六个因素。此外，它通过流动性和认知把这些个性特征和他们的变化情况整合起来。换句话说，它比较的是人们认为的情况和可以客观测量的情况。此外，除了数十年的校友研究之外，“伊拉斯谟影响研究”还分析了流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其中不仅分析有关就业技能的情况，而且还涉及到真正的职业和就业结果，以及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

“伊拉斯谟影响研究”如何开展？

“伊拉斯谟影响研究”由一个包括 56 733 名学生、18 618 名校友和 4 986 名工作人员的定量研究组成。这三个组别都分别被划分为流动和非流动人员两类。它涵盖了 964 所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了跨越 34 个欧洲国家的 652 名雇主。为了测量学生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员工出国归来后的技能，“伊拉斯谟影响研究”使用了与就业能力密切相关、且 92% 的受访雇主都认为相关的六大 memo© 因素，分别是：（1）歧义容忍度（接受别人的文化和态度以及适应性）；（2）好奇心（乐于接受新体验）；（3）自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4）平静的心态（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5）果断（决策能力）；（6）活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伊拉斯谟影响研究”还包含一个质性研究，即进行在线和电话访谈、团体访谈和高校中的院校研讨会。

流动影响巨大，但学生的社会背景同样不可忽视

“伊拉斯谟影响研究”显示，流动学生

与非流动学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出国前就已经存在。他们表现出相当高的 memo© 价值观，并且大部分来自具有学术背景的家庭。换句话说，有更好就业价值观和启动条件的学生通过出国留学，也更容易抓住这个机会完善自己的个性。

出国留学后，52% 的学生的 memo© 价值观得到真正的改善。平均而言，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比欧洲 70% 的学生表现得还要好。他们人格特质的变化相当于四年多的生活所带来的变化。非流动学生出国前需要更多时间达到参加伊拉斯谟计划普通学生的 memo© 价值观水平。然而，学生们也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进步。大约 81% 的人认为他们的进步比定量测试结果高出 30%。这表明，仅仅基于认知的调查不能完全反应出真实的影响。

除了个性以外，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还认为他们的语言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其他重要的横向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如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认知能力、与来自不同文化和环境的人的交际能力以及沟通技巧。但高等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和校友都认为这些并非他们首要关注的内容。

财富、事业和生活

2006~2014 年间，在招聘中看重国际经验，并给有国际经验的员工支付更高薪水的雇主比例增加了一倍。

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中有一半可能与非流动学生一样，成为长期失业者；毕业五年后，他们的失业率大大降低。毕业十年后，伊拉斯谟校友更有可能担任管理职务。与非流动学生相比，他们也更倾向去海外工作。

此外，伊拉斯谟影响创业态度：在参加

伊拉斯谟实习项目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获得了由项目主办公司提供的工作，近 10% 的学生开始自主创业，这个比率大约是普通毕业生的十倍。

伊拉斯谟计划的另一个目标是在学生和毕业生中建立欧洲身份认同。事实上，80% 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对欧洲有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似乎是在与外国人的社交或亲密关系中得以增强的：33% 的伊拉斯谟

校友表示，他们的生活伴侣拥有不同国籍，而 27% 的人在国外学习期间遇到了他们目前的生活伴侣。伊拉斯谟计划改变人的一生！

注：本文的写作基于“伊拉斯谟影响研究”（Erasmus Impact Study）（http://ec.europa.eu/education/library/study/2014/erasmus-impact_en.pdf）及备忘录项目（<http://www.memo-tool.net>）。

抵制东南亚校园极端主义

Anthony Welch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学教授, 马来西亚槟城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所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 anthony.welch@sydney.edu.au

极端主义一直以来都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西班牙在15世纪对阿拉伯和犹太学者的压制、纳粹迫害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红色高棉”(Khmer Rouge)对柬埔寨学者进行的大屠杀,都是对暴政不能容忍的有力提醒。

现在,校园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困扰着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许多穆斯林国家。开罗传奇的爱资哈尔大学 (Al-Azhar University),是建校早于牛津大学 (Oxford) 和剑桥大学 (Cambridge) 的伊斯兰学术灯塔,该校刚刚表示要抵制学生中的激进倾向。外界批判学校正在滋养极端主义,为此爱资哈尔大学阿扎布 (Abdel-Hai Azab) 校长最近命令负责修订教科书的学术委员会清除激进的圣战思想。

东南亚高校的极端主义

在东南亚,校园激进主义发展势头渐长,并引发了几场抵制运动。但目前的极端主义却无端而起。激进运动在该地区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某些情况下牵涉到区域自治的意愿,或者为其他地区(如阿富汗)的穆斯林而战。数以百计的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和印尼人(这群人所占高校学生比例不明),主动请缨成为圣战战士,返回后变成了激进分子。

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人见证了多次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有的运动与伊扎布

特 (Hizb ut-Tahrir),即伊斯兰解放党有关,比如日惹加札马达大学 (Gadjah Mada University) 和万隆技术学院 (Band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激进运动。目前在德国、俄罗斯、中国、沙特、约旦和埃及,伊扎布特组织是被禁止的,但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却是合法的,而且经反复调查并未发现有恐怖活动的证据。

最近,印尼建立了一个国家去激进化的蓝图,附带国家恐怖主义预防方案,重点放在受影响最严重的13个省,其中包括加强大学抵御恐怖主义的能力。然而,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主任琼斯 (Sidney Jones) 近日指出,在印尼大学培训575位培训师的意义值得怀疑,因为暴力极端分子还未曾将魔爪伸向校园——这一方面是因为类似伊扎布特的机构努力把他们赶出高校;另一方面,至少到目前为止,培训模块的细节看起来比较模糊。

我们还不清楚,近期从埃及到印尼的激进分子的访问,包括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大学 (Universitas Indonesia) 参加的一次会议,对缓和激进分子情绪有多大影响。但是,一些团体如幸存者基金会 (Yayasan Penyintas) 和印度尼西亚恐怖主义爆炸协会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Terrorism Bombings) 对大学的访问则非常成功,他们还与学生和教职工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菲律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可以部分追溯到阿富汗战争。在此战争期间，数百名信仰穆斯林的菲律宾人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加入圣战组织。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参与者是学生。激进派伊斯兰邦萨摩洛自由战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在菲律宾南部已公开发誓效忠“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有时被称为 Da'esh），而阿布萨耶夫成员被报道是在叙利亚被杀的圣战者之一。然而，菲律宾穆斯林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院长表示，媒体追求轰动效应而引发恐慌，并可能使情况恶化，这些需要密切注意。

和印度尼西亚一样，菲律宾也已邀请著名的神职人员前来访问，包括来自埃及、近期在棉兰老岛州立大学（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的神职人员。这些访问吸引了数千名学生和教职工前来参加，传播了五个支柱信仰、有效管理及与其他信仰群体和平共处等观念。但是，在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政府军队和伊斯兰邦萨摩洛自由战士发生交火，迫使数千村民流离失所。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最南部边缘省份也拉、那拉提瓦和北大年省的高校存在极端主义运动，但泰国存在的问题与萨拉菲斯特圣战组织和泰国军方不当的回应有关。

在马来西亚，之前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就读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的学生穆罕默德·法德利（Mohammed Fadly）在发誓效忠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ah）后，寻找机会为泰国南部的伊斯兰教而战。近日，马来西亚的世俗宪法和国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使得一批来自马来西亚、自称 G40 的人发出了日益伊斯兰化的警告。为了应对年轻人的激进主义，马来西亚穆斯林发展部（Malaysian

Is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以消除人们对圣战的误解，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大学对圣战的误解。一个名为“穆斯林大学生拒绝暴力”（Mahasiswa Islam Tolak Keganasan）的运动希望利用穆斯林大学学生领袖传播圣战的真正意义。神职人员对此也表示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裁决声明，宣布参与圣战和殉道的伊斯兰国家的行为是非伊斯兰主义。为伊斯兰国家而战的马来西亚人即便死了也不能被称为烈士。

马来西亚通过国内服务机构，即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Education Malaysia Global Services），已加强了对国际学生申请的审查。该机构管理所有国际学生申请事务，包括护照检查。这样一来，申请拒绝率从2011年的28%下降到2012年的24%，到2013年只有3%。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据被捕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近日透露，该组织正积极招募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来马来西亚学习。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捕的哈马斯恐怖分子透露，他和其他九人已被送往马来西亚，他们准备利用滑翔机对以色列开展恐怖袭击训练。有消息称，大约40名巴勒斯坦学生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被招募。据说招募及相关活动集中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一或两名该校知名教授已参与其中。

义胆忠魂？

这样的招募活动使人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有关以打击极端主义为目的的地区性“义胆忠魂”运动。去年，12 000多名外国人加入了叙利亚战争，其中，大约10%甚至更多人员来自东南亚，这表明问题仍然存在。虽然上述情况说明，一些恐怖主义的新兵是国

际学生（和一些国内学生），但究竟有多少人员来自高校仍是未知数。

最后，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如泰国和菲律宾）中接受穆斯林意味着什么，是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样才能削弱诸如穆斯林极端主义在伊斯兰国家大学里的吸引力。

但是，要应对极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

在该地区大学的影响，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如果大学是思想的来源，那么有必要利用这种能量更充分地研究这种现象，我们需要与社区合作，温和有度地传播穆斯林和平与理解的信息，并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形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极端主义对易受影响的年轻大学生的吸引力无疑将被削弱。

希腊高等教育：长期挑战与当前危机

Dimitrios Dentsoras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University of Manitoba)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Dimitrios.Dentsoras@umanitoba.ca

很不幸，我们描述希腊高等教育系统时，通常把重点放在缺点和功能障碍上。这种关注可能对希腊学者的个人和集体成就来说很不公平。但是，由于希腊高等教育问题的显著性、严重性和长期性，更重要的是，高校反映出希腊政府的结构和低效，因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希腊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基础，它们的持续存在是疑惑和尴尬的原因所在。直到最近，教育部竟然无法确定希腊大学共有多少名学生和教职工，这就像是官方统计机构无法给国家的赤字和债务一个准确的描述一样。希腊的大学和许多其他公共机构一样，由于长期受到资金不足的影响，连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都不完善。然而，国家经常无缘无故超支，如为所有学生免费提供书籍，或是在一些小城镇建立更多大规模学校，却又无法吸引任何学生。多数情况下，这些钱似乎花得很不均衡，消费形式也非常散漫，大部分基于政治偏好。一般来说，这些问题主要牵涉公共机构和院校。

坏习惯

希腊大学存在的最明显、最常见的几个问题源于某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常常表现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希腊的团体和个人倾向立即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抗议或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如街头示威、罢工、静坐、甚至占领公共建筑。高校的教授、教职员和学生出于某些重要原因进行抗议，导致

许多希腊大学的课程和研究经常被迫中断，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其他利益相关者提出反对。希腊的大学也因宪法的滥用而遭受损害，没有学校领导同意，警方无法进入校园，即使出现破坏或公然违法违规行为，学校也很少授权警方进入。这样的规定容许了示威活动的存在，它们常常扰乱公共生活，而当它直接指向政府体系、演变成一种典型的“希腊现象”的时候，示威就变成了一种非法行为。

主要问题

虽然存在特殊情况，但希腊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问题与困扰国家公共生活的基本问题一致。其中有两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即权力过度集中和政党政治对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会相继出现并加重影响。在欧盟国家中，希腊有着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决定，包括大学的入学要求、高校和部门的数量和结构、每个教职工的招聘，都受到希腊教育部的集中管理。这造成了一些明显的不利影响：决策周期长、对特殊情况不了解就制定计划、危机处理的反应时间拉长以及每一个政治机构和政府机构领导层换任引起的不稳定性。此外，虽然权力过度集中的表面原因是构建廉洁、客观的管理，从而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本地化的偏袒和裙带关系，但结

果却完全相反。大多数决策都是通过地下交易和交换政治利益而达成的。

同时，政党政治主宰着希腊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学生代表和大学管理者的选举按党派划分运行。大学内部的党派关系，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来说似乎都是必要的，而且会让他们自己享受到各种福利，从获得好成绩到职位升迁，再到聘用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当差。政党政治也波及到希腊高等教育的大局面。当地政客成功游说在他们所在的区域建立高校和部门，却不顾实际需要；工会领导人敦促雇用更多的国家工作人员以维持高校适当的党派关系；以及各种商家争夺利润丰厚的基础设施或服务合同。这样的暗箱操作，在希腊的公共管理层非常普遍，导致了希腊大学的效率低下、资金挥霍、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

失败的改革以及倒退的变化

为改善希腊的高等教育，人们希望首先将重点放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事实上，2011年，希腊就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一次最新的重大尝试，目的是纠正以上两个问题的一些最明显表现，尤其是高校管理中与政党政治相关的问题。但希腊的法律从来没有充分施行，也未得到全面、长期计划的补充，因此难以实现希腊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难以使其具有国际竞争力。其结果是，改革计划由

于一些小问题，如对完成学位最长期限的意见不一，以及大学内部的权利斗争而深陷泥潭。最后，新当选的希腊政府成员宣布计划收回过去大部分的法律改革并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状态。

希腊教育的最新发展令人费解。希腊学者和知识分子，口头上反对新政府的倒退，很大一部分人由于受到过时左派思想的启发，（实际上）把以往改革的废止看作是修正主义的行为。但正如希腊财政危机时推行的许多其他改革一样，这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叙述来阐明改革不仅是必要的，从长远来看更是有益的。包括新政府成员在内的许多人，都把改革视作为限制政府支出所使用的障眼法，其目的在于偿还旧债或者试图改变希腊大学的权力平衡结构。在这些方面，希腊高等教育折射出了整个希腊的方方面面，表明公众对新改革的不信任感增加。这类新改革通常也被视为建立外部控制和进一步的紧缩财政的尝试。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述和明确的长期规划，任何尝试性改革的实施注定要遭到质疑和强烈的反对。

注：在《迈入新时代》（*Stepping Into a New Era*, edited by A. Glas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Conference Conversation Starter）一书中，本文有所调整。

欧洲大学中的“不发文”学者

Marek Kwiek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院校研究主席，波兰波兹南大学（University of Poznan）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信箱：kwiekm@amu.edu.pl

根据学术圈的传统概念，全职受聘于欧洲大学但不做研究的学术人员算不上学术圈的一份子。没有发表论文就意味着没有研究。不做研究与欧洲大学的形象很不相符，不是吗？但在欧洲的大学里有好几十万不发表文章的学者。在当前大众化的高校中，难道不发表文章的做法与学术工作日益兼容了吗？

下面报道的数据是从参与“变革中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简称CAP）和“欧洲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 in Europe，简称EUROAC）调查的11个欧洲国家获得的。这些国家包括奥地利、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士和英国。在本文中我们只分析了在大学工作并参与研究的全职学者的子样本（8886人）。

国家之间的差异

数据显示，40%以上的波兰学者、15~20%的芬兰、葡萄牙、挪威和德国学者，以及不到10%的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英国学者，实际上都是没有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根据2007年或2010年在不同国家大学部门的调查，全职工作、但自称没有发表文章的学者比例如下：荷兰，2.7%；意大利，5.4%；英国，5.7%；爱尔兰，9.1%；瑞士，12.4%；德国，15.4%；挪威，15.9%；葡萄牙，18.3%；芬兰20.2%。在波兰，这个比例更是高达

43.2%。奥地利的比例为72.2%，但这一数字似乎不具可信度，在此不作评论。

不同的院校文化和国家学术文化导致科研究生力的分层。学术地位较低的高校可能并不看重学术研究，而学术表现优秀的高校可能在学术方面施加压力以促使学者投身科研。同样地，在学术方面施加压力以促使学者投身科研的情况在一些国家可能比另一些国家少得多。最近经历改革浪潮的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高校大众化的时代，在科研上碌碌无为的学者人数之多可能不该令人感到意外。但事实上，在波兰这样的国家，不同学科、不同年龄群体的学者中，没有发表文章的学者比例已超过40%，这表明波兰学术界已与欧洲大学教学与科研（即发文）结合的传统学术价值观渐行渐远了。

不发文学者的一般特点

欧洲大学不发表文章的学者有一些共同特点。不足为奇的是，在被调查的总样本（17212人）中，这些学者在非大学机构的比例高于在大学的比例。他们在兼职学者中的比例高于在全职学者中的比例。性别分布很一致：在除德国和波兰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中，这类学者中的女性人数比例高于男性人数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距在0.5个百分点。但在荷兰和瑞士，这个数字尤其高，女性与男性不发文章者比例分别是7.7%比

1.3% (荷兰), 23.5%比7.8% (瑞士)。

出人意料的是,在年龄方面,没有发表论文的学者中比例最高的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群体。但在波兰、意大利和英国,大多数这类学者的年龄都在60岁及以上。在参与调查的大多数国家中,平均而言,工程学是拥有最高不发文学者比例的学科。在芬兰和德国,该学科中不发文学者比例分别接近40%和35%;这两国均有很高的专利申请率。

不发文学者、低发文学者和高发文学者

虽然不发文学者和低发文学者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两个群体的存在明显降低了国家科研生产力的平均水平。

学术群体中不发文学者和低发文学者(即三年内发表1~4篇论文)的总比例在荷兰和意大利约为30%,在波兰、挪威、芬兰和葡萄牙达到60~70%。在德国、瑞士、爱尔兰和英国,这一比例约为50%。

相比之下,在整个欧洲,高发文学者(发表论文达到十篇及以上)的比例也高度分化:在荷兰和意大利,这个数字约为40%;在瑞士和德国,约为30%;其他国家为16~22%;而波兰排到最后,为13%。在科研能力最强国家中,荷兰和意大利的不发文学者比例最低,高发文学者比例最高。

欧洲的大学,尤其是波兰、芬兰和葡萄牙这类国家的大学,它们所拥有的不发文学者和低发文学者比例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如果不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它们的国际科研竞争力显然将面临危机。

有望发表论文吗?

当然,在大众化的时代,希望每一位欧

洲的学者都发表一些东西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对大学学者能发表论文有所期待则是可以实现的。欧洲大学的声望几乎完全依靠科研和论文出版。没有发表论文的学者应更多转移到科研压力不大的高等教育机构,或是鼓励他们离开学术职业。鉴于在绝大部分欧洲教育系统中,科研经费的竞争日益激烈,高校里那些不发表论文学者的生存空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

社会分层加剧

科学领域的社会分层日益加剧。我们的研究表明,每十篇论文中就有大约四篇(41.5%)出自欧洲大学排名前10%的多产学者之手;大约有六篇(61.2%)来自排名前20%的多产学者。而剩余80%的学者仅贡献了每十篇论文中不足四篇(38.8%)的发文章量。如果我们把欧洲的科研表现活跃学者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前半部分的学者发表的文章占有所有发表文章数量的90%(91.5%)以上,而后半部分的发文数量则小于9%。

科学领域的高发文学者、低发文学者和不发文学者一般是以其论文发表量来区分的。正如约翰·齐曼(John Ziman)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个动态平衡国家的科学》(*Prometheus Bound. Science in a dynamic steady-state*, 1994)中所言,科研“是一种严谨的追求,个人成就持续下降就是无能的表现,最终会妨碍整个系统的畅通运转。”

事实上,在欧洲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波兰的大学中,不发文学者将很快阻碍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因此,科学领域社会分层的不断变化会对学者招聘、留用和发展产生有力的政策影响。

欧洲高校的合并之风

Thomas Estermann, Enora Bennetot Pruvot

Thomas Estermann: 欧洲大学协会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 财政、管理和
公共政策发展主任

电子邮箱: thomas.estermann@eua.be

Enora Bennetot Pruvot: 欧洲大学协会项目经理

电子邮箱: enora.pruvot@eua.be

在欧洲高等教育格局中,合并和集中不是新现象。它们应对了一系列的变革动力,如:全球化、国际化、质量提升、对新教学模式的期待、排名、经济发展议程中科研和创新渐增的重要性,以及最为重要的就是应对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高校通过扩大规模就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观点,已成为合并和集中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是,无论是在高校教育系统还是在制度层面,我们都还缺乏全面的评估。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最近开展了一项研究,它从效用角度分析了25个欧洲国家中出现的合并进程,探讨了这些大学合并的基本原理,并评估了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效果。

欧洲许多大学都有大范围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了从科研项目到战略联盟,形式多样。合并是复杂的过程,需要创建新的法律制度,或是需要几个机构围绕一个中心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联盟。

据记载,2000~2015年间,欧洲大约有100所高校进行了合并。这个数字持续增长:2000~2006年,每年有三至五所高校进行合并;2007~2012年,每年有七至八所高校进行合并;2013年和2014年出现峰值,每年有12至14所高校进行了合并。

2007年以来高校合并情况加剧也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重大改革的结果。如:2007年丹麦的合并浪潮,2009~2011年比利时法语区和2013年的佛兰德地区的改革。比较突出的是2014年和2015年法国的改革,它将一系列独立院校合并组建为符合大趋势的“大学社区”(联邦式合作体)。

理据和目标

高校兼并的动力有很多,这些动力背后的依据通常包括学术因素(如,对研究产出、学习和教学结果的预期积极影响)、组织因素(如,大学结构的重新部署),以及财政因素(如,通过规模经济更有效地利用资金)。

提高科研和教学活动的质量是高校合并一贯的目标。这种提高得益于学术人才和基础设施的汇聚、更丰富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各学术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机会。

全系统改革的目标往往涉及到巩固高等教育格局,以此克服格局的分裂、实现教育大众化、避免项目重复、创造协同效应(如,整合大学和研究中心),或者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动态。

大学也把合并作为巩固其国内国际地位的一种手段。合并是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吸引外国教职工和学生并创造更多国际合作

机会的有效途径。

经济收入不应该是主要动力

欧洲很多高校系统都热切希望获得经济收益，如节省资金和人力资源等。由于许多欧洲国家筹资制度的基本特点，从财务角度看，增加教职员和学生人数是有利的。从私人渠道获得更多资金也可以纳入考虑之中。同样，在提供服务方面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比如更有效地提供专业服务，并精简日益扩大的基础设施储备。然而，经验表明，即便因为合并过程中高昂的过渡成本和实施成本，经济利益也不应该成为合并过程的主要动力。合并的实施一般要经历很长的时期，而且即使合并过程已经完成，合并花费的实际资金和给高校带来的影响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显现出来。参与合并的高校往往承认，他们低估了主流程序变化（如人力资源和财务流程）及建立高校文化所需要的时间。对过渡期持续时间的低估，导致分配给完成所有预期计划工作的时间和资源过少，同时给效率的实现和合并的整体成功也带来严重的影响。

合并成功的因素

参与合并的高校领导者和管理者应将重

点放在良好的预先评估和成本预测，需要保证合并进程良好的规划和实施，同时也需要与公共部门建立高效的合作关系。他们还必须高瞻远瞩，提高领导才能，促进教职员与广泛社区间的信任与参与。

鉴于合并过程的长期性和资源消耗的不可逆性，合并过程应该获得强有力的学术和商业支持。指定评估标准并将其平等地应用到整个机构是很重要的，以便对更大的环境进行一个平衡且可比的评估。

如果对相关成本（包括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和潜在效益（包括学术和财政上）进行评估，合并可能不是某些高校的最佳选择。学校领导和利益相关者应考虑其他可能的合作方案，以确保选择最合适的进一步方案。总的目标应该是促进结构平衡和进程合理，从而促进而不是破坏或阻碍高校学术使命的完成。

注：阅读关于高校合并的完整文章，请登录
欧洲大学协会网站
http://www.eua.be/Libraries/Publications_homepage_list/DEFINE_Thematic_Report_2_University_Mergers_in_Europe_final.sflb.ashx

欧洲短期高等教育中公私立模式转换

Snejana Slantcheva-Durst

美国托莱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ledo) 高等教育副教授

电子邮箱: Snejana.SlantchevaDurst@utoledo.edu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代表“短期高等教育”的非大学高等院校迅速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这种现象的盛行源于人们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学生群体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工业化社会对高技能人才不断变化的需求。提供短期高等教育的机构类型多种多样, 包括短期高等教育学校、理工学校、学院、学术机构、高等专业教育中心、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学校和其他许多机构。到 2000 年, 接受短期教育项目服务的学生约占欧洲高等教育学生总人数的 18%。主要关注短期职业培训、就业指向型职业培训以及提供转入研究型大学机会的项目均被取消。欧洲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都开设短期教育课程, 但私立机构服务的对象一般是公立大学忽略或具有上升需求的领域。到 2002 年, 私立机构短期教育课程的录取人数达到 1 246 480 人, 其中几乎一半的学生 (49%) 来自欧洲各地。

短期教育规模和概况

在 2003 年欧洲高等教育部长柏林峰会 (Berlin Summit of the European ministers of higher education) 之前, 短期教育项目很少被认为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自 2003 年以来, 在“博洛尼亚进程” (the Bologna process) 的推动下, 不同形式的创新型短期高等教育课程已遍布整个欧洲。与过去主要以就业为导向的短期培训方案不同,

博洛尼亚驱动下的短期教育项目不仅为毕业生就业做准备, 同时也旨在增强他们的技能, 并增加其继续攻读学士学位的机会。有了这种双重作用, 这些创新方案有可能为传统上分离开来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搭建桥梁, 为进入高等教育和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这些项目的双重作用还体现在分配给他们的资格 (提升) 框架上, 即在短期教育的第一个周期 (学士) 内采用“欧洲高等教育领域资格框架”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中的中级资格, 终身学习项目则采用“欧洲资格框架”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的五级资格标准。

如今, 28 个欧盟国家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已采用了创新型短期高等教育学历资格项目。其中, 只有少数国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就已经整合了中级学历资格项目。在其余的一些国家中, 有的认真重新设计了旧的短期教育项目, 以便将它们整合到现有的学士学位项目中, 比如丹麦、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 有的已建立了全新的中级学历项目, 如荷兰、比利时、马耳他和英国。2012 年, 私立机构的学生人数占有所有短期项目招生总人数的 42%, 远高于私立机构招生人数在所有教育机构招生总数中的比例。在法国、波兰、葡萄牙、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 私立短期教育所占比例尤其高。

私立机构的衰退

对短期高等教育项目的重新设计极大地影响着私立机构颁发的中级资格证书的数量。2003~2012年间,无论是在整体上升的短期教育入学人数的比例上,还是绝对入学人数上,私立机构短期高等教育都呈现平稳的下降趋势。这一时期,私立机构流失了近四分之一(23%)的学生。2003~2004年间发生了最严重的衰退,私立机构共流失近27%的学生。在此期间,短期高等教育得到重新定义并被纳入了“博洛尼亚进程”。相比之下,2003~2012年间,尽管也有上升期和低谷期,但是获得公立机构短期高等教育资格的人数增加了近9%。公立机构营利和私立机构亏损的结合为跨机构平衡带来了显著转变。2003年,私立机构规模已超过了公立机构,比例为2:1;到了2012年,公立和私立机构的规模大致相同。

私立机构为何衰退?

在2003~2004年中级学历资格项目出现以后,私立机构短期高等教育的衰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私立机构的衰退始于“博洛尼亚进程”开始之后,这至少表明“博洛尼亚进程”是一个关键因素。新的短期方案要求与大学本科课程密切合作,而这种合作依赖于跨高校、跨培训机构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特别是那些跨越公立与私立机构的伙伴关系很难安排。欧洲私立高等教育项目的传播处于较低一级,公立机构的本科专业却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样一来,可以推测的是,公立机构的短期高等教育项目在建立项目间桥梁上占有很大优势。

通过深入分析私立机构,我们发现,“依

赖政府”的私立短期高等教育项目的衰退最为迅速。“依赖政府”意味着超过一半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有十个国家存在这样的项目。2003年,这些国家的招生人数超过一百万,到2012年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种急速下降涉及到整个项目的中断(如荷兰),以及或者项目的缩小(如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和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加独立于政府的短期项目的学生人数在同一时期增长了24%。然而,即使独立机构学生人数在上升,依赖政府的机构的学生人数在下降,后者的学生人数仍然远远大于前者。2012年,只有182 285名学生参与独立于政府的高等教育项目,与依赖政府项目的参与人数655 868相比,这个数字仅超过了这些国家所有接受短期高等教育学生的十分之一。因此,依赖政府的高等教育机构下降的百分比依然远远大于独立机构主要增长的百分比,由此可见,私立机构短期教育的规模明显下降。

由此得出的结论表明了这些短期高等教育项目领域中不断变化的角色。如果把行业范围定为从独立于政府的私立机构到公立机构,其中也包含依赖于政府的私立机构,那么,依赖政府的私立机构的不断萎缩,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公立机构的生长,可能会被解释为公立机构“替代”或“挤走”了依赖政府的私立机构。因此,这种趋势给予我们的讯息是,在欧洲的短期高等教育领域,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的差异正在不断加深。

注:《国际高等教育》定期发表来自“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关于私立高等教育的文章,该研究项目总部设在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University of Albany)。

阿尔巴尼亚的高等教育：永无止境的挑战

Blendi Kajsiu

独立研究员、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博士

电子邮箱: kajsiu@yahoo.com

自 1991 年共产主义崩溃以来,阿尔巴尼亚高等教育就一直在大众化与资金缺乏问题的夹缝中挣扎。过去 10 年中,就读于阿尔巴尼亚大学的学生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然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对高等教育的预算。到目前为止(2015 年),阿尔巴尼亚仍是高等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小(约为 0.6%)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在阿尔巴尼亚,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但教学质量却急剧下滑。

过去 25 年中,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适应高等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所带来的挑战,已引起来自阿尔巴尼亚政府三种不同的回应。在阿尔巴尼亚转型的第一个十年(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里,该国政府主要目标是建立高校、增加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在第二个十年里,即 2005~2013 年由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执政时期,政府的主要策略是刺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以满足公立教育机构不能满足的、额外的高等教育需求。自 2013 年起,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重新执政,新的改革旨在合并公立和私立高校,把所有的高校改造成部分由国家资助、部分由私人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

1995~2005 年:公立高校的扩建

面对不断上升的高等教育需求,阿尔巴尼亚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扩大国家资助的高等

教育机构的规模。首都地拉那(Tirana)之外的现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被改造成大学。在 1992~1998 年期间,阿尔巴尼亚共成立了六所这样的大学。到 2005 年,阿尔巴尼亚各大城市也已建立起国家资助的大学。

虽然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加就读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数量,但却损害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公立大学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但国家拨款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导致了教学和科研质量的严重下降。面对教室里拥挤的学生,教师背负的教学任务过多,影响了他们的科研能力。由于财政限制,许多公立大学开始招聘和吸引薪资要求较低的、只负责教学的专职教师。许多情况下,各部门甚至连法律规定的相关师生比或教师资格的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

2005~2013 年:扩建私立高校,让市场拯救我们

在 2005~2013 年间,民主党上台后,近 50 所新建私立高校全部获得授权审批,私立高校学生的数量增加了 15 倍。政府虽然对私立高校的授权有所限制,但却没有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排名和评估。到 2014 年,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每百万居民中私立高校数量最多的国家。

从 2005~2013 年,执政的民主党对公立和私立高校教育质量的下降视而不见。虽然公立高校的录取名额不断增加,但国家资助

却没有相应上升。同时，政府还授权成立了许多新的私立大学。在一些最腐败的私立高校里，阿尔巴尼亚大学的学位竟被公然出售，出售对象甚至包括周边国家的公民，如不会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意大利人。然而，政府对这些重大丑闻不闻不问。

公立高校教学质量下降也导致一些最好的私立高校教学质量下滑。一旦公立大学在没有增加额外资源的情况下全部打开大门，进一步降低自己的标准，私立高校可选择的学生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会有所下降，相应的学费收入也会减少。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产生危机的私立高校开始通过下调师生比例和降低其他学术标准的方式来缩减成本。

社会党改革：合并公立和私立高校

2013年6月，社会党开始执政并承诺制定针对高等教育的新法律，使其达到欧洲标准。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开始展开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全面监察。2014年8月，执政政府关闭了一批被发现违反基本政府规章制度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17所私立高校和八所公立大学。政府还将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British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合作，对剩下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评估。

尽管采取了上述积极措施，一旦国家缺少必要资源来适当资助高等教育，社会党的改革依然将面临重大难题。由于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新法律允许公立大学增加学费。法律还规定，私立高校如果转变成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它们可以得到国家资助。由此，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没有国家资金支持的重大高等教育改革前途渺茫。和往届政府一样，现在的政府没有明确承诺是否会妥善资助高等教育。在社会党执政的两年里（2013~2015年），用于高等教育部门的额外资金数量非常少。虽然社会党认识到国家给予高等教育部门的经费严重不足，但他们依然反对投入资金。2014年2月，政府与呼吁减少公共支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签订了33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由此可见，经费不足的情况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改变这一论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阿尔巴尼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仍相当棘手。

注：这篇文章已收录在《迈入新时代》（*Stepping Into a New Era*, edited by A. Glas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Conference Conversation Starter）一书中，文章形式有所修改。

罗马尼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Ligia Deca

卢森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博士生

电子邮箱: ligia.deca@uni.lu

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欧盟 (European Union)。作为北约 (NATO) 的一个成员国, 加入欧盟意味着它的地缘战略选择似乎已经明确, 这也是为数不多得到公认的事。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被视为西方民主世界中大规模重整各国力量议案的一部分。然而, 近25年来, 罗马尼亚的高等教育政策很少是基于完整的信息采集、影响评估或是体系内的包容性磋商制定的。缺乏对政策变革的实际需求的反思, 似乎已成为每届新任总理在探讨如何更新国家教育法案时面临的政治困扰。

从国际准则对民主改革的影响可以判断, 罗马尼亚的高等教育已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1989年后的“国际化行动者 (international actors)”阶段, 罗马尼亚高等教育模式得到转变, 不再受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ECD)、欧洲委员会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 (UNESCO-CEPES) 的过度影响; 2004~2005年的“博洛尼亚进程” (the Bologna process) 实施阶段, 该阶段包含主要的法律改革, 旨在增强罗马尼亚高等教育的“可读性 (readability)” (含三个周期: 欧洲学分转移制度 [ECTS], 文凭补充文件 [diploma supplement], 质量保障); 最近的阶段则是全球竞争力, 主要受到排名、卓越准则及人口挑战的影响。

罗马尼亚的决策环境相当不稳定, 在过

去25年中, 20位教育部长曾试图为罗马尼亚的教育制定新的愿景。除了偶尔带来振奋人心的决策外, 这造成了罗马尼亚快速变化的决策环境、严重的官僚主义及不连贯的立法状况。

双重话语

作为近期欧盟2014~2020年财政实践计划工作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不得不提交大量的策略方案, 这些策略包含国家重点举措, 以及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过早辍学、终身学习这些方面的附加举措。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 罗马尼亚于2013~2014年制定了以上相关策略, 并提交给了欧洲委员会。尽管这些策略有其重要性, 但它们却并未被置于与教育有关的公开辩论, 此外, 奠定这些策略基础的相关分析也被那些本应该实施这些策略的人搁置一旁。显然, 罗马尼亚再次错失了仔细思考当前国内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并找寻公众支持解决方案的良机。这种机会错失源于罗马尼亚决策者的习惯。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 他们往往使用双重话语——一方面针对的是国内大众, 另一面针对的是国际行动者。

在这种情况下, 在开展任何新改革之前, 一系列公开制定的政策选项应该获得所有利益相关者及受影响者的认可, 因为一些挑战不能再被忽视, 包括人口缩减、教育公平、公共投资以及国际化。

人口缩减

罗马尼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人口数量的减少。大学不得不适应潜在学生资源的缩减,并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因此,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合理化其结构,将更多资源分配给那些学生人口还在增加的学校。由于这一举措在政治上存在困难并具有争议性,因此几乎还没有有关这方面的行动。如果得到政治家和学术界成员的支持,那么,目标明确、信息充足的平等政策以及健全的国际化政策都是良好的解决方案。

教育公平

遗憾的是,教育公平在罗马尼亚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它被认为是对社会精英主宰的主流话语的一大挑战。尽管现行的政府计划强调解决社会不平等,并且,公平已被纳入高等教育战略的三大议题之中,但政治行动者通常不在国家辩论中谈及高等教育公平。罗马尼亚的辍学率很高,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其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这使得罗马尼亚离其“欧盟2020目标”(EU 2020 target),即把过早辍学学生比例降低至11%,更远了。中学教育中的结构问题包括农村教育质量低下、教职工工资低以及缺乏完善的教职工培训等。同时,对贫苦的吉普赛学生缺乏支持也是常有的事,这导致这些群体的学生入学率很低。现在,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学生来说,读大学并非易事,在所谓精英政策的“圣坛”上,人才也在流失。

消费而非投资

尽管高等教育经费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但在欧盟国家中,罗马尼亚生均经费比

例是最低的。现行的教育法宣称教育将获得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最低公共投资。尽管教育已成为罗马尼亚主要政党选举项目的首要议程,这一数字却从未达到。较之于2008/2009年的峰值,罗马尼亚高校中现有的学生数量已超过40%。在不增加总经费公共份额及不损害国家赤字目标的基础上,这为增加生均经费提供了机会。然而,政府却选择依据学生减少的比例相应地缩减经费,因此浪费了通过充裕经费提升教育质量的良机。此外,罗马尼亚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现行教育法中实施法律规定的需求,这些法律规定能使院校在重点领域做得更好(如:就业、公平、国际化和科研表现)。一旦选举结束,国内的双重话语便出现了。

国际化——一个发展领域?

国际化已成为当前政治议程上的重要议题。罗马尼亚在许多国际政策领域都很活跃。它主持了2010~2012年博洛尼亚秘书处(Bologna Secretariat)工作,组织了布加勒斯特部长级会议(the Buchare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并于2012年4月举办了第三届博洛尼亚政策论坛(the Third Bologna Policy Forum)。同时,除了各高校在工作上取得的进展外,罗马尼亚也开展了一系列计划,以确保在国家和院校层面上制定更为连贯的政策框架。“高等教育、科研、发展和创新基金”(Executiv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Funding)是欧盟资助的一项计划,它与世界大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开展合作,旨在帮助20所罗马尼亚大学制定院校国际化战略。这两大机构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战略的未来发展起草了背景分析文件。人们一致认为高等教育

国际化相当重要，在观察罗马尼亚大学战略方案时，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如通常在非公开的全国性辩论中宣称的那样，达成这一共识的理论依据大都是与吸引非欧盟自费学生的机会相关联的。

对政策连贯性的需求

罗马尼亚可以被视为一个实验室，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民主转型 25 年中，各种国际进程、准则以及院校是如何改变高等教育结构的。尽管罗马尼亚对于国际发展持开放态度，但有关实质性改革的公开辩论及其所有权仍是虚无缥缈，部分原因在于决策者为了避免

国际污名或是失掉国内选票而使用双重话语。如果没有关于当前挑战及解决方案的良好公开辩论，而只是依靠现有的成功实践、考虑国际承诺的话，罗马尼亚高等教育领域将仍是不堪一击，它并不会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解药。

注：本文已被收录在《步入一个新时代》（*Stepping Into a New Era*, edited by A. Glas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Conference Conversation Starter*）一书中，内容有所调整。

俄罗斯大学中的制度性腐败

Nataliya L. Rumyantseva, Elena Denisova-Schmidt

Nataliya L. Rumyantseva: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高级讲师

电子邮箱: N.Rumyantseva@greenwich.ac.uk

Elena Denisova-Schmidt: 瑞士圣加伦大学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讲师,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爱德蒙·萨夫拉基金会 (Edmond J. Safra Network) 会员

电子邮箱: N.Rumyantseva@greenwich.ac.uk

俄罗斯正在成为一个学术强国, 这使其至少在金砖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的比较中显得相当成功。在经历了各类有效改革后, 包括“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招生程序现代化, 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扭转高等教育中的腐败状况。那么, 为何腐败之风在高等教育领域如此盛行呢?

本文中, 我们认为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行动者间不当的依赖关系催生了腐败。不当的依赖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关系, 它导致了不良的或是毫无建设性的结果。如果没有学位, 年轻人就无法在俄罗斯找到工作。教师面临着来自学校管理层的压力, 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住现有的学生。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管理层分别面临着来自教育科学部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和学生群体的压力。

人口危机和“不可教的”学生

现在, 许多俄罗斯大学都处于困难时期。自 20 世纪以来持续下降的出生率无疑导致了申请入学者人数的减少。虽然人口危机相当明显, 但高校的数量仍然很多。2014/15 学年, 俄罗斯共有 950 所高校, 包括 548 所公立院校和 402 所私立院校, 此外, 还有 1 600 所地区分校。其中, 只有大约 30~40 所最知

名高校获得了来自教育科学部的资助, 它们也因此 在招生上更有选择性。

余下的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只能通过相互竞争以获取生源, 而这部分学生的能力并不满足继续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能力, 也不会投入时间财力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他们只求勉强通过考核以获得文凭, 而非真正学到知识。俄罗斯的学生总人数相当多。每年, 几乎 80% 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并全部顺利毕业, 这一数字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以来一直保持不变。

大学的圈套

这种不相匹配的趋势导致了权力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需要学生胜过学生需要大学。公立大学依据学生数量的多少获得预算分配。如果它们开除学生, 则需要返还国家给予这些学生的经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笔钱已涵盖了人员和其他费用。这也意味着在下一学年, 国家会缩减预算, 大学则要解雇教职员或是终止某些学术项目。私立大学完全依赖学生缴纳的学费。除某些特例外, 如果没有学生, 这类大学将难以以为继。在正常情况下, 大学是政府授权的官方证书审核机构, 负责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而这一事实又使得上述情况更为复杂。被赋

予权利的学生和被剥夺权利的大学在利益冲突上导致了进一步的问题。这就是不当的依赖关系形成的基础。因此，大学被挤在岩石（学生偏好）和坚硬土地（政府）之间，以表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满足政府的需求，这使得大学日常的运作陷入了圈套之中。

院校适应及腐败

生存和自我保护可被视作有力的驱动因素。院校可以轻易受到这些因素的驱使从而创造方法以应对其困难。面对这一对其组织生存及个人财务稳定带来威胁的挑战，大学教师们除了降低自己的标准外别无他法，同时，他们又要保证其外部质量以使评估者满意。这种降低的标准滋生了犬儒主义、职业上的失望以及对学生和政府的憎恨，而政府却不能有效控制这一局面。

一旦标准降低、犬儒主义得以滋养，学术腐败的温床就出现了。如果教师们不能在与学生的知识参与中获得职业上的满足，那么，学生就会被当作额外收入的来源以缓解教师们内心的不满。每个教师都能自由选择是否参与到这种文化中来。那些不参与的教师也最终会被迫默认这一文化，从而降低其标准。而那些希望保持活跃的参与者则拥有了符合自身利益的额外收入（因为俄罗斯教师的收入相当低）、重新校准院校权力不均衡

以为其所用，尽管这仅发生在个人层面。因此，学术界中的“大多数”铸造了一个学术阴谋，它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结构，维持着每个教师在财务和心理上的存在，同时又惩罚那些非自愿参与这种文化的教师。

谁有罪？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学生，或者至少是一部分学生在入学时缺乏恰当的学习动机。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中，蓝领工人失掉了他们以前的威望、职业教育体系也已崩塌；如果要寄希望于那些年轻人、有时甚至是未成年人，可能有失公允。内心失望、不抱幻想且负担过重的学者们是在是否参与公然的金钱腐败或是秘密的非金融腐败（包括学术勾结，如忽略学生缺乏学术诚信）上有其自己的选择。更糟糕的是，教师们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妥。由于大部分学者毕业后留校工作，他们通常重复以前读书时学到的模式来处理问题。虽然政府大力提升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合法性，但它却忽视了自然人口趋势和中学毕业生质量。然而，每位行动者，包括政府，都是整个院校圈套和植根于扭曲关系中不断蔓延的腐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地位浸透着无助感及这样一种信念，即“堡垒”的力量强于其成员。

加利福尼亚与公立高等教育的未来

Simon Marginson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国际教育教授、《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杂志联合主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4 年高等教育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特聘教授

电子邮箱: s.marginson@ioe.ac.uk

二战以来,加利福尼亚一直走在现代化前沿。新的社会风潮和张力总是先在加利福尼亚现身,然后传往世界各地。例如,在那个特别的14年中,加利福尼亚创造了大学生力量 (Berkeley 1964)、嬉皮士及集体主义反传统文化 (San Francisco 1967)。随之而来的则是以“第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的形式出现的高涨的纳税人暴动,该提案在1978年的加州公民投票中通过,并对当地政府的税收及支出进行了限制。这些活动声势浩荡,横扫全球,在某些方面仍在进行中。另外,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硅谷和乔布斯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更不用说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和电视产业了。

在过去的60年间,加利福尼亚也领导了全球的政策、高等教育及大学科学,同时,它也引领了有关大学教育思想的演变。加利福尼亚在汇聚其高质量的公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方面无可比拟。加利福尼亚同样也拥有世界顶尖的私立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Caltech)、南加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在美国,仅有波士顿走

廊地区 (Boston corridor) 能与之相提并论。在波士顿地区,虽然私立教育得到极大重视,但仍无法与加利福尼亚媲美。

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鉴于加利福尼亚现有的高度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州同时也在公共计划和高等教育社会准入的公共原则上引领全球。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的总体规划 (Master Plan)。该规划的领导者是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他后来曾担任九所 (现在是十所) 研究型大学所组成的公共系统的主席,该公共系统即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一总体规划获得了州议会及州长的认可,他们注意到了在扩大教育机会上渐增的公众压力。

当时,加利福尼亚在高等教育参与度上居美国之首。总体规划是这样一个蓝图,以高等教育多元化供给原则,不断扩大其高等教育系统,同时保持研究型大学的高质量。

该规划奉行的是一个由加州资助的高准入模型,仅对学生收取少量学费。学生的参与成本变低,因为大部分学生被输送到两年制的加利福尼亚社区学院,也因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型分校只招收排名前12.5%的中学毕业生,而处于二者之间的学生则在四年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学习。这一三

方机制直到今天仍在延续。这一高度分层的参与系统（在其他许多国家，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学生进入研究型大学）所造成的阻碍，将被自下而上的、从社区大学向加州州立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转入的大量学生所缓解。

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的特性促成了高等教育各司其责的三分系统。同时，尽管加州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系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压力，但该三元体系的持久性也得到了印证。在早期，作为一项结合顶尖大学优异性与普及高等教育的机制，这一规划得到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大力支持。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高等教育非同寻常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该规划。

总之，该规划的优良之处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中，七所高校位于世界研究型大学前50名，九所大学均位于世界前150名。或许，在关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竞争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与斯坦福大学及哈佛大学的比较中表现得不如以前那么好（特别是从2008年经济衰退导致了经费削减后），但是，当谈及科研成果时，这几所大学的表现仍然相当优异。

总规划准入部分的维持相当困难。留下的记录也是好坏参半。

社会公平举步维艰

一方面，卓越的加州大学系统在学生准入上确实是相当公平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以及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没有机会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加州大学系统中的比例高于斯坦福大学及哈佛大学等私立院校。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数量均高于美国常春藤联盟院校中所有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数量。另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40%的本科生不用缴纳学费；65%的学生获得财政援助；一般的毕业生没有负债。在美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学费飞速上涨的国家，以上数字的确是很不寻常。在全球排名前十的高校中，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在学生准入上能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媲美，当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学生，无论家境如何，都有着杰出的学术造诣。

然而，在一个极度不公平的教育系统中，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平的贡献仅仅只是沧海一粟。根据苏珊·梅特勒（Suzanne Mettler）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美国，来自最高收入阶层的学生，71%都在成年早期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一比例较1970年的40%有了显著上升。来自最低收入阶层学生的学业完成率也有所增加，但仅是从6%增加到了10%。处于倒数第二收入层学生的学业完成率从11%上升到了15%。换句话说，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大部分仍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这为高等教育参与度的进一步增长设定了一个上限，从而确保高等教育在重复制造原来的社会不公平。

2012年，加州各院校的学生保留率仅为78.5%，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及民族社区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2012年，有73.2%的拉丁裔美国人和65.7%的非洲裔美国人完成了学业。社区学院和加州州立大学在地理位置上分布不均，加州社区学院、加州州立大学以及更高水平的大学中自下而上的学院学生流动很不一致。

为何学生准入举步维艰？元凶或许正是加州的“第13号提案”。这是一项特别的法案，它被视为“社会”原则，其中的反社会教条认为政府的税收/支出侵犯了个人自由。该提案对增加税收造成了阻碍，并触发了加州往复不断的预算危机。“第13号提案”现在仍然存在，它是试图放宽高质量公立教育准入的一大障碍。

自始于2008年漫长的经济衰退以来，加州的高等教育经费已缩减了三分之一。自1960年第一次采取这样的做法以来，各层次的院校一直在拒绝合格的申请者。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学院不再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因而许多学生被迫进入营利性教育领域，遭受着极低的学业完成率和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前所未有的学生平均负贷最高值。

路在何方？

现在，加州大学系统中的院校面临着在各种难题间无法选择的局面：急剧上升的学费、受限的学生准入，或是眼睁睁看着物质教育条件的不断恶化、教育及社会不公平的进一步加深。

在加利福尼亚，猖獗的个人主义和财政新自由主义还会控制公共利益吗？对公立高等教育的公众支持会持续下降吗？又或者加利福尼亚能找到方法以重新激发公众对教育普及和机会平等的支持，并意识到教育的方方面面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呢？如果他们真的挽救了这一系统的公共使命，其成功的例证又将影响世界。事实上，撤销“第13号提案”将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越南国际合作教育项目的陷阱

Thu T. Do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 (Saint Louis University) 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博士生

电子邮箱: tdo10@slu.edu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近十年来,越南和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数量日益增多。参与项目的高校和其他组织似乎达到了目标;然而,成功的程度各不相同。教育系统的差异及教育机构间的沟通导致了許多陷阱。因为种种原因,基于这些教育项目的目标和细节,它们中的一部分在走下坡路,一部分变得支离破碎,而另一些则需要进一步协商。

越南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

国际合作教育项目是由越南和海外高等教育机构联合提供的学习项目。学生可以选择在越南完成学业或是在越南进行部分课程的学习,然后在海外院校完成学业。整个课程体系囊括了由越南和海外院校设计的课程。完成学业后,学生将获得由海外院校颁发的文凭。

2015年1月,越南教育与培训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批准了越南的266个国际合作教育项目。提供此类项目数量前五的院校所属国/地区分别是:法国(42个项目)、英国(40个项目)、美国(33个项目)、澳大利亚(27个项目)、台湾(20个项目)。这类项目绝大多数集中于商业和经济相关领域,如银行会计学、工商管理、金融、信息技术和市场营销等。

政府监管

越南中央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管理者。尽管进行了市场改革,但越南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非联邦国家,国家力量来自于越南的最高立法机关——越南国会。中央政府通过教育与培训部来管理学院、大学以及教育交流活动。除职业教育由劳动、病弱人士与社会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Labor, Invalids, and Social Affairs)进行管理外,教育与培训部负责管理各层次的教育。教育与培训部批准由越南院校授予的所有学位,决定每年的招生、学费以及公立院校的课程设置。教育与培训部审核并通过教育交流项目,为外资项目制定策略和政策。它同时也组织、管理海外合作项目及相关院校并对院校和项目的质量进行检查。

2012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对外合作与教育投资(Foreign Collaboration and Investment in Education)的法令。该法令界定了有关教育交流的所有规定,内容涉及如何获准控制每个教室中应有的越南学生数量等内容。由中央政府和教育与培训部颁布的规定和指导方针为海外教育机构构建了一个框架,使其能与同级的越南高等教育机构一起培养学生,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些院校提供的学术项目和职业培训项目需分别获得教育与培训部以及劳动、病弱人士和社会事务部的批准。

出现的问题

尽管自2000年以来合作教育项目就已在越南开展,但直到2012年10月,越南政府才出台了有关对外合作与教育投资法案以规范这些项目。在2011~2012年间,越南政府也建立了一个审核合作项目的委员会。该审核委员会在这些项目中发现了许多违规问题。其中,无论是越南高校还是海外院校都在未经教育培训部批准的情况下发布招生和申请文件。例如,在教育培训部批准前,越南东方大学(Phuong Dong University)就已对外发布公告并在其与Humanagers(澳大利亚的一个培训组织)合作的项目中招收了大量学生。另外一些合作教育项目长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招收学生。越南美国职业培训学院(Vietnamese American Vocational Training College)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州立大学——布劳沃德学院(Broward College)间的合作就是一个例证。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该项目自2007年来已招收并培训了超过700名学生。

另一个问题就是合作项目及海外院校的质量。政府审核委员会发现一些海外院校既缺乏良好声誉,又缺乏高质量项目。在越南,许多针对潜在留学生的咨询中心目前关注的是招收并审核那些申请海外院校在线课程的申请者。例如,通过接触果园教育集团(Orchard Edu Group),一个与英国桑德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有合作关系的咨询集团,越南在线青年报(Thanh Nien Online)报道称,桑德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提供远程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并招收越南学生。该项目的申请者无需具备学士学位,只要有五年的工作经验即可申请。这一项目的时长为六至八个月。显然,这些

中心没有资格扮演入学委员会的角色。诸如此类的项目无疑是存在问题的。在越南官方发布的提供教育项目的海外高校名单中,似乎还未发现能跻身其所属国高校排名前100位的院校。想让顶尖高校在越南开设学术项目看来是有些困难的。

另一个关于项目质量的问题是高昂的学费。四年制合作项目与越南高校提供的传统项目之间学费差异巨大。例如,河内科技大学(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特洛伊大学(Troy University)联合提供合作项目。该项目的生均学费为10000美元,学生在越南上课,最后获得特洛伊大学授予的学位;与之相比,河内科技大学四年制常规学术项目的学费仅为1500美元,而这已经超过了越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11美元)。有人对越南人如何能够支付合作项目高昂的学费感到怀疑。显然,富裕的越南家庭希望其子女获得海外学位,因为他们认为海外院校授予学位的含金量高于越南本土大学的学位。这就是他们不惜冒险投入大笔资金以获得海外学位的原因。

为了应对这种种问题,越南教育与培训部决定对违反规定的院校予以经济处罚。教育与培训部同时也叫停了这些院校的招生和运行,要求他们补偿学生学费并警告毕业生从这些院校所获的文凭不被认可。迄今为止,还未有学校和个人因反对教育与培训部这些决定而进行法律诉讼。尽管如此,越南政府和相关院校之间在有关这些合作项目方面似乎仍然存在着无尽的疑虑与混乱。

结语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越南仍将继续与其他国家推进国际合作教育项目的开展;当然,

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双方都要意识到现有的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海外院校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越南的交流文化。

越南需要构建并重新确立一个旨在提升与评估项目质量的可靠体系，避免资历不足的院校踏入其教育市场。

印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

Philip G. Altbach, Eldho Mathews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首任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Eldho Mathews: 印度金奈英国文化委员会 (the British Council)

电子邮箱: eldhomathews@gmail.com

印度处于世界大国群的外围地带, 其火星轨道探测器 (the Mars Orbiter Mission) 的成功发射就是一个例证。但问题是, 印度通常表现得不像一个大国, 也没有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举个小例子, 印度的高等教育。印度在其大学和学院上的投资极度不足。世界上大多数的大国不仅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同时也有成效显著的国际高等教育“对外政策”——这有时也被称为软实力。

纳兰陀大学 (Nalanda University) 和南亚大学 (the South Asian University) 的建立是印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小规模举措。但是, 考虑到印度渴望拥有与中国比肩的新兴全球地位, 这些举措是否就足够了昵?

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处于全球学术圈的风口浪尖之上。为本地学生提供一些国际意识和知识对于其就业及其成为全球化经济体中的公民都相当重要。通过把国际学生带入本地课堂以培养海外留学生, 这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招收国际学生将推动未来合作、深化经济联系并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在培养国际学生中就已获益良多。

许多国家和学术机构已经为国际化精心制定了战略。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

(Fulbright program) 每年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学者带到美国, 也将众多美国人派遣到国外学习, 以及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也有类似项目。中国和日本都有吸引外国学生的国家项目。沙特阿拉伯政府资助一项大规模的奖学金项目, 用以输送本国学生到国外留学。

印度的举措

尽管诸如印度文化交流协会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等机构也为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 但与上述项目相比, 它在数量和专业领域上涵盖的范围都相当有限。2013~2014年, 该协会仅向就读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课程的外国学生发放了 3465 个奖学金名额。

新全球环境的出现已为印度的国际化创造了无数机会。出国留学的印度学生数量骤增, 印度与海外院校的合作项目急剧增加, 这些都是国际化发展的良好例证。此外, 近年来流入印度高校就读的国际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大部分留学生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 其原因主要在于, 较之于其他国家, 在印度就读大学和日常生活的成本都很低廉。

基于印度大学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 的最新数据, 在 2012~2013 年间, 近 2.1 万名国际学生就读于 121 所印度高校; 与之相比, 同期有 20 万名印度学生在海外留学。日本和中国分别接收了 10 万名以上的留学生, 美国则接收了超过 80 万名留学生。

印度的国际学生大都来自南亚, 正因如此, 区域化一词用在此处可能比国际化更为恰当。大部分的非印度学生就读于私立大学, 很难在公立院校找到这类学生。印度曼尼帕尔大学 (Manipal University) 是一所私立大学, 该学校 2012/13 学年招收的国际学生数量为 2 742 人, 居全国之首。

有趣的是, 大部分印度公立大学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吸引欧美等国短期留学生 (在印度学习一个学期或是不定期学习) 的潜力所在。目前, 仅有少数由中央政府资助的大学, 如尼赫鲁大学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海德拉巴大学 (Hyderabad University), 及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 (the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设置了短期来校访问学生项目。由于国际学生所缴纳的学费至少是印度学生学费的五至八倍, 所以国际学生的到来也许能为状况不佳的印度公立大学增加大量收入。除了带来额外的收入, 国际学生也有助于促进印度大学校园的多样性。

当然, 接收留学生的大学也必须改变一些有关学分转换的规章制度。近期喀拉拉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Kerala) 采取的以国际范式印发成绩单的举措可作为其他大学的范例。同样, 孟买大学 (Mumbai University) 和普纳大学 (Pune University) 采取的吸引留学生的方案也值得借鉴。除了学分转换的规则外, 接收大学也要确保留学生能享有各种设施和服务, 比如新生辅导、良好的宿舍设施、补休课程、医疗设施等, 帮助学生申请

签证, 以及学生到校后在外国人注册办事处 (the Foreigner Regional Registration Office) 注册登记等。

这一时期, 在国外运行的印度大学分校数量也在上升。著名的私立大学曼尼帕尔大学的一所海外分校, 在马来西亚运营。其他的私立大学, 如亚米提大学 (Amity University) 在美国、英国、中国和新加坡都开设了分校。四所印度私立院校在迪拜国际学术城 (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 的设立同样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另一趋势则是在拥有大量印度从业者的国家授权开设印度大学的海外中心。然而, 最近媒体报道, 因违反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关于大学区域管辖的指导方针, 该委员会敦促喀拉拉邦的圣雄甘地大学 (the Mahatma Gandhi University) 关闭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七个国际海外中心。

战略规划?

国际化目前还未列入大部分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的战略规划之中。这一情况的出现不能只归咎于印度的大学, 因为目前印度还没有管理海外高等教育机构进入和运行的国家政策。尽管《外国教育机构 (进入与运行规定) 法令》(the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ill) 在 2010 年就已进入印度议会的讨论议程, 但这一法令未能获得议会一致通过, 最后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 紧随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 (All India Council of Technical Education) 的步伐——该组织是技术教育人力资源部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for technical education) 的法定组织——印度大学拨款委

员会去年提出了一套规章制度，以便提升和保持印度与海外教育机构的学术合作标准。

联盟？

当前，只有少数印度高校与海外院校在各种学术活动上维持着密切联系，包括开发课程及授课、合作研究或教职员工和学生交流。通过采用国外课程、双边学位课程等途径，新兴的私立大学和院校在提升国际化方面表现相当活跃。但是，这些学校的目标主要在于通过使学生充分适应全球一体经济环境来提升学校的市场地位。

人们通常认为把国外教育项目融入印度大学将有效提升本国学术质量与标准，但就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这种观点未必正确。近20年来，与海外院校联合运行项目以及合作开展教育项目已日渐成为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部分。这种合作一般是在一所新兴的印度私立院校和一所中等水平的海外院校间进行的。大多数这类院校将其外籍教员和就业援助鼓吹为所获得的成绩。其中，某些拥有海外合作的私立院校在网页上大肆宣扬

他们拥有一半以上的外籍教师，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外籍人士只是在印度合作院校中短期工作。对这些院校来说，创收比教育质量更为重要，国际化能吸引更多的本国学生，从而保证其投入能够获得超高回报。

参与国际合作的印度私立营利性院校的吸引力在于：海外学位、较之于海外大学更低廉的费用、通过在海外合作院校学习一学期获得国际体验的机会、专业提升、与海外合作院校所在国大学相同的学术标准、可获取的大量在线资源、在印度完成本科学业后可以直接进入海外院校课程的入读机会、国际认可的学位以及国际就业援助。然而，有关这些院校提供的学术项目的目标、内容及质量并未得到重视，因此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是采用海外的课程设置，这些院校中的学生能否拓展其技能与视野？

尽管国际化可以为印度高等教育带来无限益处，但目前为止，印度大学还未有国际化战略。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重要议题，印度也需要参与其中。

新书速递

Martinez-Alemán, Ana M., Brian Pusser, and Estela Mara Bensimon, ed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321 pp. \$34.95 (pb). ISBN 978-1-4214-1665-6.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包括一系列从批判性视角讨论美国高等教育关键问题的文章。所采用的视角包括批判性种族理论、记号语言学、批判理论及女权主义等。讨论的话题包括：大学完善议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解构方法、人力资本理论、批判理论等。

Bhandhari, Rajika, and Alessia Lefebvre, eds. *Asia: The New Higher Education Superpower?*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5. 196 pp. \$39.95 (pb). ISBN 978-0-87206-375-4. Web site: www.iiebooks.org

亚洲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快速增长，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已在高等教育领域投入巨大。本书聚焦于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包括排名、全球知识经济中亚洲的角色、质量挑战及机遇等。诸如中国、印度、越南及日本等国家也列在在本书的讨论之中。

Bowen, William G., and Eugene M. Tobin. *Locus of Authority: The Evolution of Faculty Roles in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379 pp. \$29.95 (hb). ISBN 978-1-40086-5635.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美国高等教育在适应变化的环境上富有成效，并且美国高等教育多年来构建的治理结构具有实用价值。本书对四所不同院校及系统展开的个案分析提供了例证。作者也认为一直以来改革是合理的，因为它并未损害高等教育治理中教师参与的作用。

Hazelkorn, Ellen. *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 (2nd edit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04 pp. (hb). ISBN 978-1-137-44666-4. Web site: www.palgrave.com

本书是哈泽尔科恩（Hazelkorn）对其有着开创性的有关全球排名一书的第二修订版，该书对此前2011年的版本进行了更新。它聚焦于排名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排名的本质及排名测量的要素、排名对学生选择的影响、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Munene, Ishmael I. *Multicampus University Systems: Africa and the Kenyan Exper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60 pp. \$145 (hb). ISBN 978-0-415-82514-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讨论的不是广为人知的多校区大学系统，它讨论的是肯尼亚、某种程度上也是非洲地区部分大学面临的挑战。本书试图将各种理论观点与讨论联系起来。

Paget, Karen M. *Patriotic Betraya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27 pp. (hb). ISBN: 978-0-300-20508-4. Web site: www.yalebooks.com.

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讲述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Americ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是如何渗透并最终控制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的对外政策及活动的，该组织是冷战时期美国学生政府的代表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网络提供了大部分资金。

Palfreyman, David, and Ted Tapper. *Reshaping the University: The Rise of the Regulated Market in Higher Educ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07 pp. (hb). ISBN 978-0-19-965982-1. Web site: www.oup.com.

本书关注的是英格兰高等教育通过引入市场力量所发生的变革。在变革之下是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减少的财政援助、增加的学生花费以及学校做出的调整。学生作为消费者、科研使命、步入营利性领域等问题在书中得以讨论。尽管本书聚焦于英格兰，但也比较了英格兰与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

Ream, Todd C., and John M. Braxton, eds. *Ernest L. Boyer: Hope for Today's Universiti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281 pp. \$90 (hb). ISBN 978-1-4384-5565-5.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波尔（Ernest L. Boyer）是美国教育部长、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校长、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席。本书纳入了波尔关于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文章和演讲稿，包括学生角色、大学入学、财务问题、通识教育等。

Renn, Kristen A. *Wome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 Contex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8 pp. \$44.95 (hb). ISBN 978-1-4214-1477-5.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内容是关于一项对世界范围内女子高等院校地位的调查，讨论的问题包括：校园中的性别赋权、女子院校的校园氛围、女性入学以及世界各地女子高等院校的类别。

Sheregul, F. E., and A. L. Arefoev, eds. *University Rankings: International and Russian Experience*. Moscow, Russ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14. 504 pp. (hb) ISBN 978-5-906001-25-2.

本书概述了有关大学排名的研究和分析，旨在阐述与俄罗斯高等教育相关的有益经验。大多数章节专门针对俄罗斯，部分章节译自其它语种。

Shin, Jung Cheol, Gerard A. Postiglione, and Futao Huang, eds. *Mas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Strategy, Quality, and Challenge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5. 371 pp. \$129 (hb). ISBN: 978-3-12672-2.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就东亚的大众高等教育展开了大量讨论，对国家及跨国主题都进行了分析。书中讨论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更广泛的议题包括西方及亚洲高等教育的进步、大

众高等教育体系的就业前景、质量问题、大学治理等等。

St. John, Edward. *Refinancing the College Dream: Access, Equal Opportunity and Justice for Taxpay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3 pp. \$32.95 (pb). ISBN 978-1-4214-1578-9.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是对美国本科教育经费的全面论述,从本科教育如何获得经费的角度出发,本书探讨了在获取途径上面临的挑战。在美国,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们都在分析经费问题。本书对如何扩大经费来源、解决财务问题等给出了建议。

Stolker, Carel. *Rethinking the Law 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Outreach, and Govern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54 pp. (hb). ISBN 978-1-107-07389. Web site: www.Cambridge.org.

本书是仅有的从全球视角展开的有关法律教育的研究,关注的主题有:大学中法学院的角色、各国的法学院、法治、学校、法律专业出版活动、教学问题等。本书作者曾任荷兰一所法学院院长,现为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校长。

Tierney, William G., and Julia C. Duncheon, eds. *The Problem of College Readines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222 pp. (hb). ISBN: 978-1-4384-5723-9.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本书的背景是在美国,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对进入高等教育的预备状态。作者认为预

备状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与社会经济状态及其他因素相关联。本书也对早期评估等项目进行了讨论。

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Expanding Out, Expanding Up*. Montreal, Canada: 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14. 162 pp. (pb). ISBN 978-92-9189-147-4. Web site: www.uis.unesco.org.

本书聚焦于亚洲研究生教育的推广,包括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个案研究及对亚洲地区研究生教育广泛趋势的分析。书中有用的数据材料涉及科研趋势及亚洲各类教学科目等。

Wechsler, Harold S. *The Qualified Student: A History of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 404 pp. \$34.95 (pb). ISBN 978-14-1285360-6. Web 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

本书是关于美国大学选择性招生的经典研究,是其最初发表于1977年的更新版本。研究主要包含四项个案研究,本书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有关选择性招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作者指出,在其他要素中,招生政策在使用上存在群体歧视,同时,有关招生的标准各不相同且存在矛盾。

Weis, Lois, Kristin Cipollone, and Heather Jenkins. *Class Warfare: Class, Race, and College Admissions in Top-Tier Secondary Scho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292 pp. \$30 (pb). ISBN 978-0-226-13492-5.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

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学习这一话题在美国备受关注。来自工薪阶层或是少数族裔家庭的优秀学生，虽然就读于顶级高中，但通常不会进入一流大学。这项细致的研究探究了以上学生如何看待教育、他们的前途如何、他们的学校如何对其做出回应等。

Yonezawa, Akiyoshi, Yuto Kitamura, Arthur Meerman, and Kazuo Kuroda, eds. *Emergi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2014. 261 pp.

ISBN 978-94-017-8821-2.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讨论了在东亚的全球化 and 区域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新兴作用和功能以及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启示。在本书的12个章节中，来自东亚及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探讨了以下主题：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科研、跨国（境）教育、（国际）统一化、区域合作和（子）区域化、学生流动及其他东亚环境中的问题。编者将这些问题置于东亚高等教育在寻求区域及全球发展的背景之下。

